经典的改造与普及
——以节本为中心的《资治通鉴》阅读史研究*

张赟冰

提要：《资治通鉴》内容浩博，素有难读之称，读者多用删繁节要之法，以助阅读。司马光亲撰《通鉴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，是为删节《通鉴》之始。一些学者在阅读《通鉴》之时，提纲节要，自编节本。更多读者则利用他人所编节本。南宋以后，《通鉴》节本大量刊印，广泛传播，经久盛行。在相当普遍的阅读实践中，《通鉴》节本完全替代了原书应有的位置。节本在删削原书之余，亦因应读者需求，不断增补附益，其内容和功用很快超出原书之外，衍生出“简明编年史”的著述体系，并且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影响至深。

关键词：《资治通鉴》　节本　简明编年史　经典流传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，体大思精，传为不朽，千百年来，备受推重，上为经筵必讲之书，下为士林必读之作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，相关论述已详，不必赘言。[①] 然众所周知，《通鉴》又素有难读之称。司马光曾说：“光修《通鉴》，唯王胜之借一读；他人读未尽一编，已欠伸思睡矣。”[②] 即便博学渊识如朱熹者，也对弟子说：“《通鉴》难看，不如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”[③] 当代的实际情形也表明，真正能读、通读、乐读这部大书者，不过凤毛麟角。那么，一部浩繁难读之书如何产生广泛的影响？历朝历代的读者究竟如何阅读和使用这部难读又不可不读之书？欲更为准确地认识《通鉴》的历史地位，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。欲回答这些问

* 张赟冰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。
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知识社会史视野下明代私修本朝史研究”（22CZS032）阶段性成果。初稿草成以后，蒙张升、苗润博、胡宸、徐隆垚等师友指教，受益良多；期刊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，谨此志谢！

① 李全德《〈资治通鉴〉史话》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9 年，第 126—139 页。
② 刘羲仲《通鉴问疑》，《津逮秘书》第三集，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。
③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《朱子全书》第 14 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354 页。

题，就必须考察《通鉴》具体的阅读情形，全面展开《通鉴》阅读史研究。关于《通鉴》的研究成果不啻汗牛充栋[①]，但对其阅读史的考察，却仍付阙如，这不可谓不是“通鉴学”亟待开拓的一个领域。

《通鉴》之所以难读，究其根本，乃编年体的固有特性使然。宋人对此已有充分认识，如杨万里尝言：

> 予每读《通鉴》之书，见事之肇于斯，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。盖事以年隔，年以事析，遭其初莫绎其终，揽其终莫志其初，如山之峨，如海之茫，盖编年系日，其体然也。[②]

后世论编年体史书寡味难读，大抵皆不出此说。不过，编年体固然有难读的一面，却也有易读的一面。作为中古时期编年史的范本，《汉纪》编撰的直接起因正是汉献帝“常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”[③]，乃令荀悦用编年体加以改编。实际上，司马光修《通鉴》，也是因为正史卷帙浩繁，“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，毕世不暇举其大略，厌烦趋易，行将泯绝”，故而有意“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网罗众说，成一家书”[④]。盖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排比史事，最能简明扼要地呈现历史演进的脉络与趋势。诚如吕祖谦所言：“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，论一时之事，纪传不如编年；论一人之得失，编年不如纪传。”[⑤]

同为追求易读的编年体史书，《汉纪》成“简要之文”，而《通鉴》以难读著称，其中的关键因素，无疑在于两书纪事详略不同。《通鉴》纪事之繁复，内容之浩博，总体远过《汉纪》。纪事简，篇帙少，虽“事以年隔”，也不难记忆和翻检；纪事详，篇帙富，一事若绵亘数年，便难稽首尾，不易省览。就编年体而言，纪事愈简则愈彰显易读的一面，愈详则愈彰显难读的一面。由此言之，造成《通鉴》难读的主要原因是内容浩博、篇帙宏富，既如此，若欲避难趋易、化繁为简，那么删繁节要将是行之有效的办法。

事实上，历代的确产生了大量的《通鉴》节本，其传播之广，受众之多，远非原书所及。对于《通鉴》节本，前人也不乏关注和讨论，但大多从传统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，将其视作《通鉴》的枝属，不甚重视，且在研究理路上倾向于在节本和原本之间严辨町畦。[⑥] 但若着眼

---

① 详参各篇研究综述：宋衍申《〈资治通鉴〉研究概述——为〈通鉴〉修成九百年而作》，刘乃和、宋衍申主编《〈资治通鉴〉丛论》，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—45 页；翟清福《近四十年来台湾〈资治通鉴〉研究概述》，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3 年第 11 期，第 16—21 页；马婧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“通鉴学”研究述评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 25 辑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406—419 页；汤勤福、李日升《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〈资治通鉴〉研究述评（1983—2011）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11 年第 4 期，第 27—36 页；卢庆辉《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〈资治通鉴〉研究述评（1986—2015）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 38 辑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 379—387 页；卢庆辉《近年来大陆地区〈资治通鉴〉研究概述（2011—2017）》，《宋史研究论丛》第 24 辑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19 年，第 452—464 页；闻惟《〈资治通鉴〉文献研究述评》，《唐宋历史评论》第 8 辑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1 年，第 169—184 页。

② 杨万里《通鉴纪事本末叙》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卷首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 年，第 1 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二《荀韩钟陈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2062 页。

④ 刘恕《资治通鉴外纪》卷首自序，《四部丛刊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4 年影印明刻本。

⑤ 吕祖谦《丽泽论说集录》卷八《门人集录史说》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《吕祖谦全集》第 2 册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18 页。

⑥ 张煦侯《通鉴学》，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9 年，第 168—171 页。傅骏《金元通鉴学之研究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7 年，第 24—26、61—71 页。左桂秋《明代通鉴学研究》，青岛：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50—52 页。王彦霞《清代通鉴学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70—98 页。秦丽《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：以〈少微通鉴节要〉与〈十八史略〉为中心》，《古代文明》2019 年第 2 期，第 116—124 页。朱治《〈资治通鉴节要续编〉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18 年第 3 期，第 66—77 页。

于《通鉴》的流传与阅读，则节本与原本实密不可分。节本是《通鉴》原本流传过程中的产物，也在《通鉴》的阅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因此能够成为研究《通鉴》阅读史的重要切入点。如果将节本排除而非融入《通鉴》的阅读史，则恰恰抹杀了节本最重要的历史意义。有鉴于此，本文拟从节本切入，对《通鉴》阅读史的一个侧面展开初步探讨，考察历代读者如何利用删节之法或者通行的节本阅读《通鉴》，分析这部史学经典如何迭经改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普及，希望通过《通鉴》阅读史的个例，对经典流传的某些普遍性特征，形成新的思考和认识。

二、辅助原书：温公的期许与后人的实践

司马光修《通鉴》，本以简要易览为志，故修书之时即设法便利读者，其中就用到了删繁节要的办法。与《通鉴》一并成书进上的，还有《目录》三十卷，“略举事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”[①]。如张煦侯所言，“目录虽凡书尽有之，而《通鉴目录》自有其内容，不可与寻常简端所冠者同观，名为《目录》，实节本也”[②]。到了晚年，司马光“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，而《目录》无首尾”，又撰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，“以绝二累”[③]。是书久佚，其详虽不得而知，但它是《通鉴》的节要本，则毫无疑问，据卷数估算，其篇幅约为《通鉴》四分之一强。

温公在修《通鉴》之余，又亲撰《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两种节本，其用心显然是期望读者在二书的辅助之下，更好地阅读《通鉴》。两种节本详略有别，其辅助原书的途径也有所不同。《目录》的用途是在阅读原书之时“以备检寻”，必须与原书相辅而行，才有意义，而《举要历》芟繁剪芜，自具本末，能够独立阅读，初学者可以先读《举要历》，进而循序渐进，再读《通鉴》原书。但这只是理想状况，读者是否果然如温公之期许，利用《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的辅助阅读《通鉴》，并无实例证明。

相反，有一些例证显示，不少学者并未借助现成的《目录》和《举要历》，而是在阅览《通鉴》之时，自编节本，以助研读。在这种阅读实践中，节本不是读《通鉴》的进阶，而是产物。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著录“陈忠肃通鉴帖十五册之一”，跋称：

> 右陈忠肃公手编《通鉴节要》真迹十有五册。先生亲接温国，见闻之近，心潜孔圣笔削之传，爰即成书，聿提纲目，阅岁积日，亲系其凡，伟矣哉！百代之宏规，三长之绝识也。是书始更始元年，迄于唐敬宗，其间错杂，尚匪全本。嘉定乙亥七月，珂在中都，以钱三十万得之先生之孙某。[④]

按陈忠肃公名瓘，字莹中，宋哲宗时，“薛昂、林自官学省，议毁《资治通鉴》，瓘因策士题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，昂、自意沮”[⑤]。据《玉海·艺文》，陈瓘另撰有《通鉴约说》，尝“谓《通鉴》

① 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末《进书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 年，第 9863 页。
② 张煦侯《通鉴学》，第 169 页。
③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四《编年类》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113 页。
④ 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十八《陈忠肃通鉴帖》，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清乾隆间活字本。
⑤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五《陈瓘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10962 页。

如药山，随取随得”[①]。足见其乃北宋时少有的精熟《通鉴》之士。就《宝真斋法书赞》抄录的陈氏《通鉴节要》之《光武》《明帝》二纪来看，其内容与《通鉴目录》近似，但要事多有遗漏，纪年亦往往不确，应当是陈瓘阅读《通鉴》时随手所做的笔记。

陈瓘阅读《通鉴》之时，提纲节要，自编节本，这种阅读方法并非特例。朱熹教子弟读《通鉴》，也要求“须作纲目，随其大事札记某年有某事之类，准《春秋》经文书之”[②]。此处所谓“纲目”，与前引岳珂所言“纲目”，皆为“纲要”之义。不过在读《通鉴》过程中由摘录而形成的节本，并非一概如此简略。《朱子语类》记载朱熹另一处教子弟读《通鉴》之言，要求“一代帝纪，更逐件大事立个纲目，其间节目疏之于下，恐可记得”[③]。“立纲目”与前说无异，但所谓“节目”，应当是与纲目相对应但内容更详赡的节要。按照这种阅读方法，在读《通鉴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略一详两种节本，略者近似《通鉴目录》，而详者近似《通鉴举要历》，且两种节本天然融为一体。笔者认为，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的成书，纲目体的生成，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读书方法的自然延伸。[④]

宋代其他一些学者，虽然条例不如朱子这般严谨，但大抵采用了相同的读书方法。史载洪迈“手书《资治通鉴》凡三”[⑤]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洪迈《节资治通鉴》一百五十卷”[⑥]，当是其读《通鉴》过程中形成的节本。又如李繁，字清叔，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进士，有多部史钞性质的著作，包括《通鉴汉唐详节》《汉唐事类》《三国捷径》《南北精华》等。[⑦] 曾噩，字子肃，绍熙四年（1193）进士，有《班史录》二十卷、《通鉴节要》十三卷等书藏于家。[⑧] 这反映了使用摘抄节录的方法阅读《通鉴》的普遍性。

阅读《通鉴》之时自编节本的现象，即便在各种坊刻节本已极为盛行的明清时期，仍不绝嗣响。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元刻本《资治通鉴》（索书号：06741），系明人文徵明旧藏，经文氏子孙四代宝藏，后归常熟严氏，又经严氏四代相传，而后流入瞿氏铁琴铜剑楼。此本保留了文、严两家几代人所作的大量题跋，反映了两家世代授受诵习《通鉴》的情况，提供了一个关于明清士人阅读《通鉴》的生动案例。[⑨] 据书中题跋所言，严虞惇在康熙间读《通鉴》，曾边读边辑《通鉴提要》，“大指以温公《目录》增损为之。《目录》烦琐，不甚贯续也”（卷四末）。其孙严有禧，乾隆间“在长沙监司，事简公暇，即取《鉴》读之，见有经济作用，裨益政治，嘉言美行，足为坊表者，随手摘录，久而成帙”（卷二百九十四末）。严氏祖孙所为，与宋代学者并无二致。

---

① 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九《艺文》，元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刻至正十一年修本。
②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十七，《朱子全书》第 18 册，第 3684 页。
③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，《朱子全书》第 14 册，第 354 页。
④ 张赟冰《纲目体生成史论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23 年第 3 期，第 119—122 页。
⑤《宋史》卷三百七十三《洪皓传附子迈传》，第 11574 页。
⑥《宋史》卷二百三《艺文志二》，第 5093 页。
⑦ 魏了翁《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七十八《朝奉大夫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奉大夫李公墓志铭》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4 年影印宋开庆元年（1259）刻本。
⑧ 陈宓《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》卷二十二《大理正广东运判曾君墓志铭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319 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影印清抄本，第 543—545 页。
⑨ 陈光崇《一部〈通鉴〉的奇遇——兼述清初社会情弊》，《通鉴新论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61—180 页。

朱熹曾说,《通鉴》须“有记性人方看得”[①]，此言不仅道出了读《通鉴》的困难，也指明了克服困难的途径。故而也就不难理解，何以摘抄节录成为志学之士用以辅助阅读《通鉴》的常见方法。盖手抄能够强化记忆，而节录个人所需内容，亦有助于快速翻检。当然，以摘抄节录之法辅助阅读，其事出现甚早，非始于宋代，后世行用亦广，不仅用于《通鉴》[②]。读《通鉴》者用此法，既是《通鉴》的内在特性使然，也是通行的阅读习惯所致。但无论如何，将《通鉴》这部大书详览一过，辑录切要，非勤奋与毅力过人者，断不能为之。对于以上所举例证，不可过分高估其代表性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对《通鉴》的阅读完全是另一幅情形。

三、替代原书:《通鉴》阅读的名与实

朱熹反复主张在阅读《通鉴》时自编节本作为辅助，并躬行示范，无疑会引起不少学人效仿，但真正有志与力追步大贤者，不过是极少数人。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，自身虽力有不逮，但利用他人成编，尤其是名儒宿学所编节本，不失为折中良法。何况如本文首节所言，简明扼要的编年史本身就有很高的阅读价值。因此，出自名家之手或假托大儒之名的《通鉴》节本大量刊刻流传，将是理所必然之事。

北宋时期，受党争牵连,《通鉴》之学尚未大显。宋室南渡以后，元祐党禁解除,《通鉴》重获朝廷重视，经筵进讲，旧版重刻，其学因之顿盛，随之也涌现出大量节本。南宋时期的《通鉴》节本名目纷杂，有号称司马光自节的，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司马光《通鉴节要》六十卷[③],《郡斋读书志》亦著录“《通鉴节文》六十卷”，称“右题司马温公自钞纂《通鉴》之要，然实非也”[④]；又如今见宋刻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详节》和《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二种亦然[⑤]。有伪托吕祖谦之名的，如今见宋刻《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》《吕成公点校集注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详节》以及蒙古刻本《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》[⑥]。有借重高第者之荣的，如今见宋刻《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节要》和《省元林公集注资治通鉴详节》。有以集合众家相标榜的，如今见宋刻《增入名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》。各种节本名目迥异，内容实则一脉相承，不过是坊贾为吸引读者，不断标新立异、巧立名目而已。[⑦] 但这也从

①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,《朱子全书》第 14 册，第 355 页。

② 王记录《论“史钞”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16 年第 3 期，第 1—12 页。曲柄睿《佣书成学：中古知识的结集、生产与传播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23 年第 1 期，第 142—151 页。

③《宋史》卷二百三《艺文志二》，第 5092 页。

④ 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五，孙猛校证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 212 页。

⑤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详节》现存两种刻本。一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；一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两本版刻极似而点画微异，当是一本据另一本翻刻。国图藏本卷题多划去“详节”二字，且仅存正文一百卷；日藏本为全帙，正文之前，尚有卷首部分及《入注附音资治通鉴外纪》四卷。《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残存十六卷，配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宪宗三年（1253）张宅晦明轩刻本《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》。

⑥ 学者多以吕祖谦和吕大著为二人，然王国维指出“东莱历官终于著作郎，故谓之大著，唐人所谓大著作是也”，其说是也。见王亮整理《传书堂藏书志》卷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195 页。

⑦ 对现存各种《通鉴》节本相关的文献考证，前人已积累较多成果。详参张元济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，陈先行整理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 年，第 317—322 页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，第 91—93、100—102 页。傅骏《金元通鉴学之研究》，第 24—26、62—71 页。林嵩《通鉴胡注论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99—109 页。

侧面反映出当时《通鉴》节本颇为盛行，受众很多。

《通鉴》节本诸家竞胜的局面，在元代幡然一变。一种可能产生于宋末的节本，于元代光大其传，几乎压倒了其他所有《通鉴》节本。是本题《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》，托名北宋人江贽编撰，实则是在南宋时期流传的节本的基础上，大幅删削、间有增补而成。[①] 明初，此书经增补改编，于宣德年间重新刊行。自是而后，流传更广，终有明一代，盛行不衰，几乎成为《通鉴》节本的专指。正统间，范理曾注意到,《少微通鉴节要》“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”[②]。现存《少微通鉴节要》的明刊本，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，尚有大约二十种之多。[③] 直到明末“纲鉴”类史书兴起，此书始逐渐式微。

节本之所以盛行，是因为它依托着《通鉴》的盛名，而又比原书简便，对于部分读者群体而言，不妨先读节本。宋人黄日新尝著《通鉴韵语》一书，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著录于小学类，称其“大略如李瀚《蒙求》四言体，而列其事于左方”[④]。盖此书体例为先用四言韵语概括事纲，继而详叙始末于下，是一部发蒙读物。黄氏曾问序于周必大，周氏复函称“详观足下所次韵语，自云以《通鉴节要》为主，然后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概”。可见此书虽名“通鉴韵语”，实本诸《通鉴节要》，说明在作者看来，初学只需了解《通鉴》节本所节录的史事便已足够。元末人孔齐曾记述道：

> 江西学馆读书，皆有成式。《四书集注》作一册钉，经传作一册钉，《少微通鉴详节》横驰作一册钉，《诗苑丛珠》作一册钉，《礼部韵略》增注本作一册钉。庐陵娄奎所性游学溧上，其子弟皆如此，云易于怀挟，免致脱落也。此法甚便，吾甚效之。至如僻地，尤宜此法。[⑤]

可见至少对江西学子而言，《少微通鉴节要》此时已同“四书五经”一般，是人人必须肄习之书。这显然是《通鉴》才应该拥有的地位，而在实际的阅读情形中，却是由《通鉴》节本替代。明代也有与之相似的案例。譬如明中叶著名学者郑晓，“有异资，年十二能诵经传及《通鉴节要》”[⑥]，是则经传之外，《通鉴节要》乃学人少时先读或者必读之书。

《通鉴》节本另一个重要的读者群体是科考士子。前文提到《通鉴》节本有以“陆状元”“林省元”标题者，显然就是为了招徕士子。士子为应付策论，须了解历史大势，最好熟稔一些有资于治的故事。编年排列史事，且以资治为首要宗旨的《通鉴》，无疑最能满足士子的需求。但研读《通鉴》颇费工夫，不利于备考更加重要的经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通鉴》节本适可成

---

① 关于《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》的编撰年代与底本的考证，详参金菊园《〈少微通鉴〉早期版本研究：以宋元时代的文本演变为中心》，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3 年，第 35—44 页。金氏认为此书的底本是与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》同属一系的节本，然在改编的过程中，对其他节本也多有参考。

② 范理《读史备忘》卷首自序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 19 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,1996 年影印清雍正九年（1731）继志堂刻本，第 620 页。

③ 此处仅简单统计书名明确标识“少微”者，然坊刻之书，率多依托伪冒、肆意改易，往往名实不符，如此统计自不够精确，只大体可见其刊本之多。

④ 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卷上，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，第 1103 页。

⑤ 孔齐《至正直记》卷二“江西学馆”条，庄敏、顾新点校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62 页。

⑥ 徐阶《世经堂集》卷十八《明故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端简郑公墓志铭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79 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 年影印明万历徐氏刻本，第 756 页。

为绝佳的选择。一方面，节本简便易览，省时省力；另一方面，节本虽删去一些内容，但一般会保留大政事、大善恶，亦足以应付科考。因此，仅就应付科考而言，《通鉴》节本甚至更胜原书。宋儒楼钥曾注意：

> 《资治通鉴》不刊之书也，司马公自言精力尽于此书，而士夫鲜有能遍读者。始则以科举而求简便，世所传节本，自谓得此足矣；名宦既成，则又多汩于利名之场，益视为长物矣。[①]

这说明为科举而读《通鉴》的南宋士人，往往舍原书而读节本。明代著名文人汤宾尹的个人阅读史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。汤宾尹少时读书纯粹以举业为导向，范围极狭，而《少微通鉴节要》是其中仅有的史书。何焯载：“汤祭酒自言少时，其父唯教以制义，暇更涉猎《少微通鉴节要》《性理大全》，略知二三场题目出处而已。他书则恐妨功，屏弗令见也。”[②] 最终汤氏于万历二十三年（1604）高中榜眼，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，证明其父的做法确有成效。以理揆之，经千万士子的长期实践总结，科举正确的备考策略早已被世人研究透彻，乃至推向精细化的极致。汤父所为，一定程度上应是时人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。

节本的盛行，读者对节本的钟爱，理论上讲无碍于《通鉴》原书的阅读。司马光本就期许读者以节本为进阶，从而更好地阅读《通鉴》。但事与愿违，真正在节本辅助之下阅读《通鉴》，或者读过节本之后进而研读原书的，恐怕只是极少数人，对大部分“浅学俗士”而言，读过节本已然足够，《通鉴》原书反可束之高阁了。前引楼钥之言表明，宋代士大夫往往在及第之前为求简便而只读节本，在及第之后又因“汩于利名之场”而无心阅读原书，所以很少有遍读《通鉴》者。事实上，即便并非“汩于利名之场”，只因十载寒窗，浸淫日久，很多人的视野可能就此定型，及第前对《通鉴》节本熟读成诵，及第后对其他史书仍不闻不问。明万历时人叶向高尝回忆道：“余为诸生，见先辈议论，多以通经学古为高，即《纲目》浩繁不能遍览，若《通鉴节略》必熟诵默记。”[③] 以通经学古为高者，竟也不过熟诵《通鉴节略》而已，连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都觉得浩繁而不能通读，那么比《纲目》更加浩繁的《通鉴》，又会有几人问津？从中既可见明人史学之荒芜，亦可见《通鉴》节本在明人阅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。以至有学人竟本诸《通鉴节要》治史，如正德三年（1508）进士田维祐撰《东源读史录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是书采集史事及前人史评，衷以己意，其自跋谓于正德丁丑取《少微通鉴节要》读之，偶有所见，辄录于楮。”[④] 丁丑为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是则田氏在进士及第以后，仍钻研《通鉴节要》不辍，俨然视之为诸史会要、史家正典，而这本应是《通鉴》的地位。无怪乎一些有识之士对明人自锢于《通鉴节要》的现象提出批评。如陈霆指出，节本往往存在曲解原文文意的现象：

---

① 楼钥《通鉴总类序》，沈枢《通鉴总类》卷首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4年影印元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吴郡庠刻本。

② 何焯《义门先生集》卷十《杂著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20册，影印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姑苏刻本，第239页。

③ 叶向高《苍霞余草》卷五《纲鉴臆编序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125册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影印明万历刻本，第441页。

④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十九《史部·史评类存目一》“东源读史录”条，第25册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57页。

“少微江氏作《通鉴节要》，学者多喜其径便，而不知以其节省字句，故多谬误。”[①] 蔡磥则认为，节本简略，读之难识大体：“问读史之要。曰：‘观近年学者，看《通鉴节要》，疏略苟简，不知有一代之治体，有一君之治道。’”[②] 节本疏略，本不必多言，惟有学者普遍尊之过甚，以至替代原书，这样的批评才有针对性可言。所以，这也从侧面证明，当时许多学人只读《少微通鉴节要》而不读《通鉴》原书。

长期以来，《通鉴》被奉为士人必读之书，历代号称熟读《通鉴》者不可胜数，引用、评说《通鉴》者也不胜枚举，这些人在名义上都是《通鉴》原书的读者。但上述阅读史事例显示，在宋明学人相当普遍的阅读实践中，《通鉴》节本完全替代了原书应有的位置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很多读者所谓读《通鉴》，实际读的是《通鉴》节本。这可谓是《通鉴》阅读史的一个基本面相。毫无疑问，节本或多或少忠实传播了原书的部分内容，但节略文字会导致信息遗失，容易造成断章取义，乃至与原意大相径庭，且对于《通鉴》这样浑然天成的著作，一旦文字大幅删减，精气神便随之俱失，也是理之固然。何况，《通鉴》节本在出现不久，便不再仅仅是节略原书而已，删削之余，亦有所增补。自脱胎于原书以后，节本与原书长期并行，其增删校改、传录刊印，自有独立轨迹，这意味着节本的内容总体上距离原书愈来愈远。因此，节本所传播的《通鉴》，实则忠实与曲解并存，删削和附益共生，它因拓展受众从而了扩大《通鉴》的影响，也因替代原书从而削弱了《通鉴》的作用。

四、自成体系：节本的演变与“通鉴”系谱的衍派

节本替代原书的阅读实践，带来了双重影响。一方面，在理想状况下“理应”阅读《通鉴》的部分读者，却只读节本，从而使《通鉴》原书更加乏人问津；另一方面，赖节本之简便易读，《通鉴》的部分内容和思想，为更多人所接触和了解。这是一个双向的历史过程：改编者和出版者迎合、引领、塑造着读者的需求，又时时受到读者需求的刺激和推动。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：因应读者的需求，节本不断推陈出新，并且衍生出新的文献系统，历史知识的传播也随之不断拓展边界，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。从《通鉴》的阅读史出发，能够以新的视角观察宋代以降编年体史书的演变，以及历史知识的普及。

司马光撰《通鉴目录》与《举要历》，是将其作为《通鉴》著述体系的一部分，其预设的读者应是有志于阅读《通鉴》原书之人。南宋初期，有一部号称司马光自节的《通鉴》节本颇为流行，名儒若胡安国、胡寅、朱熹、周必大、俞成等人，都曾提及这部节本，或辨其伪，

① 陈霆《两山墨谈》卷十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 96 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5 年影印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李檗刻本，第 131 页。

② 蔡磥《洨滨蔡先生语录》卷九《评史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939 册，影印明嘉靖刻本，第 571 页。

或信其真[①]。这说明其预设读者当与《举要历》相似，其内容也仅仅是节略《通鉴》，未羼入其他内容，否则学者不致难以分辨真伪。但大概出乎撰者意料的是，《通鉴》节本获得科考士子青睐，从而开拓出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。新的读者群体有着新的阅读需求，最大程度地助益策论写作，是其所望。于是，通行的《通鉴》节本在内容上出现了首次重大演变。现存的各种坊刻《通鉴》节本，无不在节略《通鉴》的纪事之余，又补入大量史论，一般采自名儒著作，如胡寅《致堂读史管见》，或者假托诸儒之名。增补史论主要是为了吸引科考士子，因为出自“名儒”的史论可供士子在写作策论时参考乃至剽略，从而使《通鉴》节本更能满足士子的需求，所以坊贾才会以“陆状元集百家注”“林公省元集注”之类的字样标题。既然在删节原书之外，又增补了一些内容，那么严格而言，节本至此已近似一种独立的著作，不再纯粹是“简略版”《通鉴》了。

元代以后，既有的《通鉴》节本又在两个方面逐渐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一者，自宋末以降，朱熹《通鉴纲目》的地位不断提升，由羽翼《通鉴》一跃而比拟《春秋》，影响更在《通鉴》之上。元明两代学风，总体重《纲目》而轻《通鉴》。那么作为《通鉴》的节本，此时便与主流学风不符。再者，《通鉴》纪事止于后周，节本因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距离读者现世渐远。当宋祚尚存之时，著述和传播本朝史事或许有所妨碍，但易代之后，前朝编年史纷纷成书，如《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》《宋季三朝政要》《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》等，可能皆是元代书坊所编，反映了元人对于宋代史事强烈的阅读需求。相形之下，此时《通鉴》节本便有阙如之憾。元明革命以后，其理亦同。为了趋合这两种阅读需求，《通鉴》节本的内容再次发生了重要演变。

明永乐年间，王逢、刘剡师徒对《少微通鉴节要》做出改编，两人着意将此书与朱子《纲目》建立联系。王逢认为：

> 少微先生《通鉴节要》一书，甚有益于学者，不旬日读之，而数千载兴亡治乱了然在目，诚为读史之捷径也。然统纪殽混，学者莫知适从，当以文公朱子之例读之，然后进于《纲目》，庶乎三纲五常之道，《春秋》经世之法，可得而识耳。[②]

此言对《少微通鉴节要》的批评，是按照《纲目》的标准，而对该书的期许，亦是由之“进于《纲目》”。这次改编的一个重点，也正是据《纲目》的书法校正统纪[③]。《少微通鉴节要》原本是《通鉴》的节本，此时却俨然成为《纲目》的进阶。嗣后，刘剡又秉承王逢之意，本诸陈桱《通鉴续编》、胡粹中《元史续编》等书，编成《资治通鉴节要续编》三十卷，纪宋、辽、金、元四朝史事，与《少微通鉴节要》合并刊行。《资治通鉴节要续编》的体例颇为独特，纪事先提其纲，后备其详，实质上是纲目体，但未采用大书分注的形式，而是将纲与目用大字连书。这样一方面与所续之书的体例在形式上保持一致，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盛行的纲目体在本质上相同。王、

① 黎靖德辑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四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8册，第4173页。周必大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一百八十七《书稿卷二》，王蓉贵、[日]白井顺点校《周必大全集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755—1756页。俞成《萤雪丛说》卷上《文字节要》，李伟国、孙莺整理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《全宋笔记》第7编第5册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31页。

②《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》卷首“刘剡识语”，明宣德三年（1428）刻本。

③ 金菊园《刘剡编刻〈少微通鉴〉述论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9年第3期，第57—67页。

刘二人的改编和续修，拓展了《少微通鉴节要》的纪事范围，又尽可能趋近主流的《纲目》之学，满足了读者的需求，因而大获成功。此后刊行的《少微通鉴节要》，几乎全部出自王、刘改编本，也多附刊刘剡《续编》。

如前所述，在普遍的阅读实践中，其实很少有读者由《通鉴》节本进于《通鉴》，而当《少微通鉴节要》与其续作合并刊行后，即使在名义上，该书也不再是《通鉴》的进阶或附属。这不仅因为它的纪事范围已大幅超出《通鉴》，更因为《通鉴》节本的续作并非《通鉴》续作的节本，而是将节本本身作为独立的续补对象。经过改编和续补的《少微通鉴节要》，贯通历代，自成一体，它以“通鉴”为名，而融合《纲目》手法，纪事简要，多附史论，更方便科考士子，更贴近普通读者，其内容、体例、宗旨、读者群体都独具特色，较之《通鉴》及其后继的网罗宏富,《纲目》及其后继的书法谨严，足以另成一种编年史类型，姑可以“简明编年史”称之。①

刘剡续补本《少微通鉴节要》的广泛流传，表明能够为读者提供简明扼要历史知识的“简明编年史”著作，在明代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，这种社会基础也孕育出更多的同类著作。弘治十六年（1503），大学士刘健等上言，称《通鉴纲目》《纲目续编》《通鉴节要》《通鉴前编》等书“篇帙浩繁，事端分散”，故拟将其“各照原文通加节省，贯穿成编，以便御览”②，最终在正德二年（1507）修成《历代通鉴纂要》九十二卷。几年后，明武宗“偶检《少微节要》，悦之”，命司礼监重刻此书及其《续编》，并亲制序言。③这表明“简明编年史”与《通鉴》《纲目》一样，其价值得到了官方的充分肯定。这种肯定态度在清代得以延续。乾隆间，清高宗敕命儒臣在《历代通鉴纂要》的基础上“重加编订”，修成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一百十六卷，“是书排辑历朝事迹，起自黄帝，迄于明代，编年纪载，纲目相从”④。借钦定之威,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在清代中期以后名列“闱中书籍”，成为科举士子的标准读物。⑤清末科举改制，首场“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”，规定考官命题“谨以《御批通鉴纲目》《御批通鉴辑览》及历代正史为本”⑥,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因而继续风行不辍，对近代不少读书人影响极大⑦。

至于书坊主导编撰的“简明编年史”，则更加丰富多样。其中数量最多、影响最大的，是晚明开始流行的所谓“纲鉴”类史书。此类史书于《纲目》《通鉴》各取一字称名，以标榜融会二者。“纲鉴”类史书的编撰，直接受到《少微通鉴节要》的影响，时人尝明确言之。如明末清初人徐秉义为《纲鉴会编》作序称：“明季学者以举子不能读《通鉴》全文，又仿少微体删而纂之，一纂再纂，而割裂挂漏、断续不谐者多矣。”⑧“纲鉴”类史书中亦有篇帙较多者，

① 值得注意的是，燕永成《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》(《文史哲》2014 年第 6 期)一文也使用了“简明编年体史书”的概念，本文所谓“简明编年史”，虽名称与之近似，而语境大不相同，故内容亦迥异。燕文所说的“直接脱胎于纲目体本朝史”的“简明编年体史书”，在本文的分类中，更倾向归诸“纲目体系列”。

②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百九十九，弘治十六年五月辛卯，台北：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66 年，第 3695 页。

③《少微通鉴节要》卷首《御制重刊少微资治通鉴节要序》，明正德九年（1514）司礼监刻本。

④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七《史部・编年类》“御批通鉴辑览”条，第 14 册，第 302—303 页。

⑤ 曹南屏《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、考试实践与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》,《学术月刊》2017 年第 9 期，第 145—150 页。

⑥ 张静庐辑注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》卷一《会奏变通科举章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7 年，第 62 页。

⑦ 王乐鑫《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》,《史学月刊》2022 年第 9 期，第 116—126 页。

⑧ 徐秉义《培林堂文集》卷三《纲鉴会编序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131 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 年影印清抄本，第 64 页。

但总体而言，较之《少微通鉴节要》及其续编，此类史书往往篇帙更少、内容更加简略。[①] 盖晚明学风嚣浮，士人多束书不观，即使《少微通鉴节要》与《历代通鉴纂要》，也显得太过繁复，因此叶向高才会追慕“熟诵默记”《通鉴节略》的“先辈”，于是“简明编年史”也进一步简略，以适应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。即便明清鼎革以后，学风丕变，但坊刻“纲鉴”类史书风行如故，经久不衰。其中堪为典范者，如康熙间吴乘权等人所编《纲鉴易知录》，直到清末民国时期依旧广为流行，近代一些著名学者如张元济、吕思勉、周作人等，都是由此书而始知国史梗概。[②] 若论对近世读书人知识世界的塑造，《纲鉴易知录》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之类著作的影响恐怕远在《通鉴》与《纲目》等原典之上。

《通鉴》节本和“纲鉴”类史书的盛行，对于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也影响至深。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，往往在书名、内封面或正文中以“按鉴”自相标榜。所谓“按鉴”，即依据《通鉴》及其枝属、衍生之作。这既是演义小说编创的实际写照，也是书坊用以吸引读者的宣传策略。[③] 究其根源，乃因《通鉴》节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官私“简明编年史”著作在宋代以后极度盛行，成为很多人最熟悉、易得的史书，也成为其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。从各种《通鉴》节本，到晚明盛行的“纲鉴”类史书，无不在书名中保留“通鉴”或“鉴”的字样，以标识其与《通鉴》的密切关系。长此以往，“通鉴”已演变为一个符号，一种象征，它是信史的标志，也是故事的渊薮，故而演义小说以此作为取材，并用以标榜。演义小说较之“简明编年史”，阅读门槛更低，受众更广，随着演义小说的流行，“通鉴”之名，《通鉴》及其衍生之作记载的某些史事，《通鉴》及《纲目》所蕴涵的部分思想和义理，也以某种变体扩展到更广泛、更基层的社会群体。

从《通鉴》原书到名目纷繁的节本，再到形形色色的“简明编年史”，再到盛行海内的演义小说，“通鉴”的系谱不断衍生出新的支派。每一次衍派，都意味着历史知识的选择和加工，也都伴随着受众群体的延伸和扩展。这个系谱的起点是一部令人昏昏欲睡的浩繁经典，而其末端的触角延伸到十分广阔的社会基层，巨大反差的背后，是宋代以降古典文献的流传与改造，以及历史知识通俗化与普及化的长期历史进程。

五、结　语

经典如何影响文明的传续与文化的发展？这无疑是历史学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。欲回答这个问题，既需要回归原典，发明其本义内涵，也需要立足史实，考察其流传实态。就前者而言，应注重对原典的比勘、注释、考证和阐发。就后者而言，则有必要考察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，读者究竟如何认识和理解经典，他们所接触和获取的经典是何种面貌，具体又如何加以

① 乔治忠《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》，《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407 页。
② 曹南屏《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、考试实践与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》，第 156—157 页。
③ 纪德君《“按鉴”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3 年第 5 期，第 110—122 页。

阅读和利用。以往的研究相对更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，有意无意间将经典纯正、理想的面貌等同于其实际流传的面貌，将迭经加工改造的异本和“变体”视作与经典全然不同的文献，甚至斥之为妄改、窜乱，在研究中将其剔除或淡化。这或许不免偏颇。

有研究者指出，中古时人喜读《汉书》，然其实际所读，多为《汉书》节略本。这种阅读实态，在权威和规范文本构建的强大话语权力之下，长期隐而不彰，甚至被遗忘。[①]《通鉴》的情况与之类似，而留存的相关资料更多，我们能够借之还原更加丰富、具体的历史面相。《通鉴》的阅读史表明，世人因《通鉴》浩繁难读，多弃原书而读节本，历代大部分读者所阅读、使用、理解的《通鉴》，实乃《通鉴》节本。节本依附原书的盛名而备受欢迎，原书依托节本的“浅俗”而扩大影响，节本与原书在这里不可能分别讨论。《通鉴》的阅读史还表明，阅读并非一种线性传播，而是一个复杂、动态的历史过程：学者文人积极改编，坊贾推波助澜，读者主动选择，进而促使改编者推陈出新，乃至形成新的著述体系。所谓文本与社会的互动，正在于此。通过对“通鉴”系谱的概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部晦涩浩博的经典，如何不断地广开沟渠，将其影响力渗透至广泛的社会群体。如果仅仅局限于《通鉴》原书，既无法解释《通鉴》为何产生广泛的影响，亦不能揭示通俗史学和演义小说的知识源泉，从而也就不能全面认识《通鉴》对于宋代以降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。

当然，《通鉴》的改编不限于删节一途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和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更是两部耳熟能详的改编之作，也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，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或许有不少读者是由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进而阅读《通鉴》，更有许多学人将《通鉴》与《纲目》合观并论，即如本文所讨论的《通鉴》节本，也多受《纲目》的影响。这些都昭示着《通鉴》阅读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，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。

书 讯

变动的传统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

陈侃理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 年 5 月

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依赖历史记忆，并在记忆中不断重构。历史研究可以重复既有的认识，固化某些传统，更应该追溯传统的形成与演化，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。本书力求跃出藩篱，融合政治史、制度史、思想史、科技史、宗教史、史学史的视野，围绕“祭祀”“历法”“灾异”“佛教”“华夷”“修史”“典志”“谱学”八个主题，重新观察、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、心态及其变迁。“变动的传统”，意味着政治文化不是僵死之物，其活力正源于解析和重塑的种种可能。

① 曲柄睿《佣书成学：中古知识的结集、生产与传播》，第 149—150 页。